

吴瑞林史料

(下册)

耿仲琳 著

吴瑞林史料

(下册)

耿仲琳 著

编

目 录

上 册

序

战斗在川陕苏区	1
鏖战齐鲁	235
鸭绿江——嘉陵江	515
抗美援朝中的第 42 军	775

下 册

镇守南疆	1059
最可爱的人	1413
两稿存真	1867
后记	1927

镇 守 南 疆

自序

我在南海地区工作了11年，这是我一生中在一个地区战斗、工作最长的一个阶段，也是我所经历的革命工作和战斗任务比较艰巨和复杂的一个阶段。我在南海地区的工作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个阶段是1955年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海南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到1957年10月调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为止，整整两年的时间。我任海南军区司令员这一阶段内主要是抓战备和部队整训，因为美国以其第七舰队为主力，其中有四艘航空母舰的编队、三至四个师的陆战队，还有蒋介石的十个师，必要时还要使用南越伪军吴庭艳的部队，准备向我海南岛进攻。我们所进行的战备和战局部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

第二阶段是我于1959年12月31日到南海舰队任司令员、1963年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起，到1968年10月调海军任常务副司令员以前。计算起来，我在海军南海舰队工作了八年，我的精力主要是抓南海舰队的建设，重点抓战备和“援越抗美”作战。

1962年法国从越南撤退后，美国就将侵略的矛头转向越南，扶植吴庭艳，想走法国的老路，先抢占越南再

大举进攻我国。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英明决策，作了战略转移，将我国沿海防务重心由北海、东海转向南海，加强了南海的全面战备，为以后所进行的“援越抗美”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书中记述的事实，就是我在南海地区作战指挥、战场准备和部队作战、训练、建设的情况。我如实记录下来，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查阅有关资料，难免有些事实在时间、地点等问题上有些出入，但希望能给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的史料。

吴瑞林

1993年8月于北京

第一章 受命南海设防

……主席台上叶帅宣布：“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同志中将军衔。”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自己被任命为海南军区司令员。授衔之时，也是受命之始，我百感交集。1955年10月，朱总司令受中央委托南下广州，处理海南军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毛主席号召全军指战员向科学文化进军。1950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由毛主席亲笔起草的《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1953年初，我率42军由抗美援朝前线归国，执行党中央交给的守卫祖国南大门的任务。1954年10月，组织上让我离职到武汉市中南军区文化速成中学高级干部班学习文化。这一年，我39岁，我的儿子已14岁，小学毕业后考上武汉第四中学。而我在高级干部班学的还是小学课程。我的同学和战友们都无限感慨地说：“儿子都上中学了，老子才上小学。”旧社会，因为家里穷，我没有条件上学。革命战争年代，天天打仗，也没有系统学习过。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今后就很难担负保卫祖国、统兵作战的任务。所以，学习文化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如饥似渴地投入了学习生活。遗憾的是，学习不到一年时间，我又奉命离开学校回部队工作，只得了个速成中学毕业证书。

1955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于9月开始实行军衔制度。这是党和人民对军队的巨大关怀，是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当时，中南军区一分为二，成立了广州军区和武汉军区。我虽在汉口学习，但仍是广州军区的干部，9月末接到通知，广州军区的军以上的干部都回广州参加授衔授勋典礼。

广州军区举行了隆重的授衔授勋典礼。那天，我们这些在旧社会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工人和农民，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后，都穿上了浅蓝色毛料将军礼服。礼服的领子上都镶着金色的

将星和松枝图案，袖子上绣着金色的条纹，裤缝镶着红色的条纹。我们头戴镶金箍的大沿军礼帽，脚穿乌黑锃亮的皮鞋，手戴雪白的手套，人人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坐在礼堂的前几排座位上，静静地等待着授衔授勋典礼的开始。谁也没有说话。我低头打量着自己这身将军服，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想，这不是一套普通的军装，这是几十年革命战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啊！他们没有活到今天，而我们这些幸存者却得到党和人民给予的巨大荣誉……

想着想着，授衔授勋典礼开始了。叶剑英元帅和中南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治委员陶铸等领导同志登上了主席台。陶铸同志庄严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授衔授勋典礼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军乐队高奏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听着这激昂的歌声，我想：是啊！中国革命胜利了，人民解放了，新中国也成立六年了，但是，居安思危，国际帝国主义还在封锁遏制我们，被赶到台湾岛上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还在，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我们这些拿枪的人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还要时刻准备打仗。在悠扬欢快的乐曲声中，由叶帅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授衔授勋。从授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和陈明仁、冯白驹等同志的军衔开始，包括广州军区所属的陆、海、空三军的上校以上军官，逐个被点名上主席台。由叶帅和陶铸同志亲手将军衔肩章、功勋章及证书郑重地交到每个人手中，然后由工作人员帮助每个人佩戴起来。主席台上叶帅大声宣布：“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同志中将军衔。”我怀疑是自己听错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自己被任命为海南军区司令员，在这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此事。我镇定了一下，走上台，向叶帅和陶铸同志敬礼，郑重地接过了任命书、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刻，我觉得手中的军衔肩章和功勋章沉甸甸的，这是党、国家和人民给予我的崇高荣誉，更是交给我的比泰山还

重的担子。党和人民对我的恩情比海深。

授衔以后，中南局和广州军区为将、校军官举行了庆功宴。授衔之时，就是我被任命为海南军区司令员之始。典礼之后，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陶铸对我说：“瑞林同志，你回武汉后立即结束你的学业，办理离校手续，将家搬到广州来，着手考虑海南军区的领导工作。”

(二)

1955年10月，朱德总司令受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委托，前来广州处理海南军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朱总司令德高望重，深受大家的敬重。朱总司令来到广州后，住在中南局招待所东湖的小岛上。

授勋典礼后的一天，中南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陶铸同志和中南局副书记兼广东省省长陈郁同志、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召集原海南军区的两届司令员，新任司令员吴瑞林，新提升的政委谢镗忠（原海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海南军区副司令员马白山（当时他没有出席），海南区党委书记张文烈，副书记兼行署主任肖焕辉，组织部长李女同志到中南局招待所拜见朱总司令，聆听他对海南军区工作的指示。

陶铸同志主持会议。朱总司令说：我受中央、中央军委的委托，前来处理海南军区在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建国以来，海南军区的建设是有成绩的，但在工作中有两个问题的处理是错误的。为了加强海南军区的备战工作，团结全军、全岛人民一起奋战，保证执行好防卫祖国南大门的任务，中央军委检查了海南军区的备战工作，认为有两件事办得不对，必须立即予以纠正。

1. 海南军区对海南岛作出的“将敌人消灭在水际和滩头”的备战方针是不正确的，因而围绕这一方针所作出的备战措施亦

是错误的，花了一千多亿人民币（旧币）在沿岛设防，将东线和南线钢筋水泥工事建筑在沙滩上，几度台风之后，工事绝大部分被摧垮了，有的只剩下残缺的底座和废墟，反而为海岸增多了障碍，此项损失极大，相当损失了一个中型机械厂。不立即改变战备方针，则影响海南岛的固守。这是我来海南，要你们办的第一件事。

2. 海南军区把坚持斗争 23 年红旗不倒的老红军部队琼崖纵队，投入种植橡胶园，是不得当的。而且善后工作做得不周密，使有些老战士、伤残人员、红军家属未得到适当的安排，没有使其安家落户，任其流离失所，沿途乞讨，有失军心，有失民心。中央决定，对琼崖纵队投入种植橡胶的善后的安置问题，要迅速解决，以安定军心，挽回影响。

朱总司令强调：把老部队建制解散，却把新部队保存下来，这样做是不对的。中央决定拨 200 亿人民币（旧币）作为安置部队复员人员和伤残、老弱人员的安家费，你们必须把这一工作及时办好。

陶铸、陈郁同志插话说，如 200 亿人民币不够的话，中南局还可以补充一些。事后中南局补了 30 多亿人民币（旧币）。

黄永胜曾任华南军区参谋长。总司令讲话后，黄觉得海南军区办错的这两件事，自己作为参谋长应负有一定的责任，为此他伤心地哭了，并作了检讨，承担了部分责任。

朱总司令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话，当时没有人做记录，除中南局正副书记陶铸、陈郁外，还有黄永胜，海南军区前两任司令员吴克华、梁兴初，新任司令员吴瑞林，新任政委谢镗忠，海南区党委书记张文烈，副书记兼行署主任肖焕辉，组织部长李女八个同志。朱总司令嘱咐：这次他来传达的中央指示，就是在这个范围了，你们讨论后，得把工作布置下去，迅速纠正。

会议由陶铸、陈郁、黄永胜主持继续进行。大家听了朱总司令的讲话后，对海南军区所做的两件事都很痛心，有关的同志主

动作了自我批评。海南区党委书记张文烈和副书记肖焕辉同志做了情况介绍，谢镗忠同志也介绍了情况。听了他们的情况介绍后，大家更感到这两件事纠正处理的迫切性，首先要抓安置部队复员人员和家属的问题。与会的同志表示决心要变压力为动力，一定把工作做好，挽回影响，补偿损失。

陶铸同志说：“老吴，你是新到的司令员，你讲讲看吧。”

我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还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中央既然任命我到海南工作，我只能先表一个态，拥护总司令传达的中央军委的指示，为稳定部队情绪，根据总司令指示，对中央指示精神不再扩大传达。但对今后工作安排，要一字不漏的传达，认真贯彻执行。”

陶铸、陈郁、黄永胜等同志都认为我讲的这个意见很好，张文烈、谢镗忠同志也同意我的意见。谢政委还说：“中央军委决定由朱老总挂帅来视察海南军区的问题，我们拥护，对朱老总的指示我们要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一定要把事情办好，请中南局领导同志放心。”谢镗忠同志最后提出：吴司令要尽快到职。并提出建议，要朱老总先在广州休息，待我们把工作做到一定的程度，再请总司令去海南岛。

陶铸同志同意了他所提出的这个意见。

会议结束后，回到军区萝岗招待所驻地，我与谢镗忠政委、海南区党委书记张文烈、副书记肖焕辉和海南军区副司令员马白山，对贯彻执行朱总司令传达的中央指示又作了一次研究，决定回海南岛后，先召开海南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团长、团政委一级参加，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尽快将工作做好。谢镗忠同志先回去作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准备在会议上传达报告。我立即回武汉办理离校手续和搬家，争取最快的时间赶回来主持海南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党委会议召开时，由肖焕辉同志和副司令员马白山同志在会议上讲话，因此要他俩事先做好准备。

(三)

在广州参加了贯彻朱总司令传达的中央关于解决海南军区问题的会议后，我立即返回武汉，结束了我在高干班未完成的学业，将家暂时搬到广州军区萝岗招待所三号楼。因当时我妻子刘军要生孩子了，她不能和我一起去海南岛。将妻子与孩子安排好以后，我立即参加了海南军区党委扩大会议。

会议是由我主持的，谢镗忠政委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军委和中南局的指示，肖焕辉、马白山同志都在会议上发了言。军区副司令员毛和发与政治部主任郁文同志都发言表态拥护中央军委和中南局的指示，并表示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在会议上对如何做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第一，先以师为单位，进行调查，摸清情况。查清在师所属的范围之内有多少老红军干部、家属子女没有安置，需建多少房屋，需开垦多少土地，修几道水渠，打多少眼井，才能使流离失所的军人和家属得到安置。

第二，组织人员，准备建筑房屋的材料，针对海南岛的气候，建简易房屋用木材、稻草、竹竿、椰子叶等就可以了。各团要自行准备工具，同时将建筑材料准备好。

第三，各师将情况摸清后，各团领导干部带着情况到军区来开会，在会议上具体分配任务，把为转业老红军建家立业的任务，落实到团。此项工作要求 10 到 15 天完成。

第四，对完成任务好的单位，要给予奖励。对完成不好和完成不够好的，要进行补建和重建。

第五，准备迎接朱总司令来验收。我鼓励大家说：“我希望你们都能受到朱总司令的表扬，受到总司令的表扬，就是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我们 43 军是一支老红军部队，也是经历了抗日

战争的老八路军部队了，具有红军和八路军的光荣传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我相信在执行这次任务中，大家一定会把工作做得更好。”

各师的领导干部都表示一定要把此次任务完成好，迎接朱总司令来验收。

第二章 总司令到海南

1956年1月，陪同朱总司令视察天涯海角。从中线到西线，总司令一路看一路作指示，审查新的防御作战方案，听取海南驻军布防和生活情况汇报……对海南军区的工作，朱总司令指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琼崖纵队转业复员人员安置问题，二是海南岛的设防问题、部队吃蔬菜的问题……总司令指出海南的领导对种植橡胶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离开海南岛前，康克清大姐特别同我谈心。

(一)

朱总司令 1955 年 10 月到广州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以后，仍继续在广东、广西视察。我们抓紧工作，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把中央指示都贯彻下去了，战备工作及对复员人员的善后工作，都安排好了，部队情绪稳定，党政意见也初步统一了。我们将情况报告了广州军区，报告了朱总司令，请总司令来海南岛视察。

1956 年 1 月 16 日，朱总司令的专机从广西飞抵海口市。总司令先住在海口市海南区党委院内。

第二天，朱总司令先同海南区党委书记张云同志谈了海南岛的资源情况并视察了海口市及附近郊区。他访问了二十多户老红军干部、战士的家庭，见他们都住上了新屋，安了新家，十分高兴。总司令向老红军的家属子女问寒问暖，问他们的生活是否方便，是否有粮食吃，是否有油盐吃，有水吃。当时有两户吃水不方便，有几户植树太少。当地驻军在两三天内就帮助他们打好了井，院子里种上了树。总司令知道后，很满意。当晚，区党委设宴招待了朱总司令。新来的海南区党委书记张云说：“我们以海南的特产来招待总司令。”

朱总司令说：“海南岛是宝岛，物产丰富，今天桌上的文昌鸡、嘉积鸭、东山羊是过去蒋介石才能吃上的，今天我们大家都能吃上了，我们一定要把海南岛开发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二)

1 月 18 日，朱总司令由我和海南区党委第三书记肖焕辉陪